

马志恒文集



I

干扰记忆

Disturbing Memories

理查德·森尼特 (Richard Sennett) 纽约大学人文科学教授。著有《公共人的式微》(The Fall of Public Man, 1977) 和《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和城市》(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1994)。

达尔文的遗产

查尔斯·达尔文是最著名的一位自然史学家，但由于他的生物时间观，他的著作对我们理解记忆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尔文把生物放在比以前的宗教创生观和生物史长得多的一个时间语境之中，因此，他创造了一个难题：以数百万年来衡量的自然时间与我们在其中用数十年和数世纪来衡量比如社会等级的成长或城市的发展的人类历史时间框架是什么关系呢？历史时间似乎只是进化尺度上的一个标志。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指出，既然个人的事件通常仅仅横跨数天和数月，那么，我们个人的时间经验在达尔文式的事物图式中甚至根本就是更加无关紧要的。

而且，达尔文给自然时间赋予了一个不同的特点：他把它描述为冲突的和竞争的。适者生存的观念后来才进入达尔文的思想，而且他对这个想法也有些模棱两可。他并不像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男爵（Alfred, Lord Tennyson）那样想像自然“连牙齿和爪子都是血腥的”，但他的确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系统依赖于它包含的物种的一直处于变化中的力量和弱点，而灭绝和物种衰退是这个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时间是一个毁灭者也是一个创造者。

人类社会和心理学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如此构想的时间呢？对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其他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最著名的是，适者生存证明了资本主义秩序的痛苦的合理性——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自然时间剥夺了人类社会的理想主义。无论与适者生存的人类相悖的正义理念可能提出什么，斯宾塞认为，当置入自然时间的漫长间隔（longue durée）的情境中时，它也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自然”，因为它的经济过程反映了那个漫长间隔中的自然选择。

但是，达尔文的著作也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触动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伟大的法国神经病学家让·马丁·夏尔科^①来说，进化似乎解释了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因。夏尔科说，随着情感的增殖并且变得多样化，它们在人类的内心中就相互冲突和竞争起来；男人和女人在自身内部的主观交战就和他们在社会中相互交战一样多——主观交战是“自然的”，我们变成的自我就像在这些内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一个物种。

正是对达尔文的发现的这后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回应，塑造了我们目前思考记忆的方式。记忆是对已经过去的时间的意识在达尔文的时间框架中，我们的记忆是一些琐细的记录；我们显然无法唤起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物种的数百万年的意识但冲突的、竞争的达尔文时间序列显然也给我们能够介入其中的那些恢复时间的行为带来了麻烦。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和伊甸园式乐园的平静恢复，一个更准确的记忆行为向我们揭示了痛苦和斗争的一个无穷无尽的记录，这些痛苦和斗争已经把我们塑造成我们现在变成的这些生物。忠实的记忆揭开了遗忘所不能医治的创伤；冲突、失败和灾难的痕迹永远不能从时间中抹去。进化论重构的科学似乎为这些难以根除的痕迹提供了证明。记忆的真实中根本没有抚慰

卡尔·马克思在其对 1848 年的革命的研究中独自得出了这种看法。他觉察到革命的怀旧情绪，这可以从那一年为了 1789 年的大革命而反叛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而且他后来对达尔文的阅读强化了他怀旧的敌意——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记忆是谎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年轻时就是达尔文的一位热心读者，他从夏尔科那里了解到，当夏尔科描述的内部战争变得无法忍受时，记忆的大门就会关闭；对过去的忠实记忆需要怀旧所不需要的勇气，因为当我们适当地回忆时，被意识到的痛苦的拼接只会变得更加厚重。

不过，如果我们记忆的内容没有提供抚慰，那么，我们记忆这些创伤的方式对于达尔文的继承者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些缓解。和弗洛伊德一样，马歇尔·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卷中也对记忆作用得出了这种观点；被回忆的痛苦或冲突能够被对象化，而当下的痛苦就不能。在我本人的社会学领域，同样强调我们记忆的方式塑造了有关

集体记忆的研究。

这种研究始于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他认为，当家族和共同体分享他们的记忆时，他们就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通过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即使他们回忆的内容是创伤性的，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经济灾难。也就是说，集体记忆是社会力量的一个源泉。迪尔凯姆充分认识到，这些集体共享的记忆大概绝非客观的和事实性的；群体凝聚的程度毋宁说是依赖于记忆的神话式的属性。不过，他仍然希望，通过分享记忆而不是把记忆私有化，共同体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讲述有关他们自己的事实。问题是，如何找到？在迪尔凯姆看来，在那种共同的对话中介入的声音越是多样，所谓被回忆的内容就越可能准确：他是第一个自由的记忆理论家。

我已经考察了达尔文的时代以及遗产以求理解似乎互不相干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即今天的人们理解资本主义历史新篇章的方式，这一篇章创造了灵活的经济制度并且消除了福利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当然，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重新出现在这个新秩序中，它强调那些在其工作中具有技能和灵活的（即适应的）行为模式的人的适者生存。打动我的是人们在对这个政治经济变化过程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做准确记录时所遇到的困难：对最近经验过程中所忍受的伤害的否认，共同分享记忆以创造神话而非精确的历史的倾向。

我相信，只有通过适当的回忆（也就是通过变得更加客观），人们才能真正应对记忆的创伤，而且我确信，迪尔凯姆的自由信仰仍然是引人入胜的。适当地回忆某个共同受到的伤害是人们自身无法完成的事情，而是必须由不同声音的一个群体来分担。但是，现代经济组织似乎抵制人们一起回忆；它并不支持他们的这些努力。我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回忆和重构

要使集体记忆的困难更加清楚，就需要阐明心理学家最初开始系统地研究记忆的创伤时所使用的一个划分。关于这个问题，在 19 世纪晚

期，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

有些人（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关注回忆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在其中能够准确地从过去唤回事实或事件的那些场合。例如，心理学家冯·齐伯林（von Sieberling）给人们看桑苏西的皇帝（the Kaiser at Sans Souci）的照片，第二天让他们尽可能地回忆照片的细节。由美国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率领的另一派心理学家关注作为一个重构过程的记忆。这个学派研究了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形成语言陈述的那种故事讲述。

记忆的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回忆的能力可以警示或非难我们对过去所编造的故事——就像当我们回忆起有关父母的某个麻烦的事实，但它与我们在有关我们自己成长的英雄叙事中给这个可怜人指定的位置不能吻合时那样。我们赖以塑造记忆的这些故事反过来促使我们回忆某些意象或事实，而把其他的交给神经的垃圾箱。实际上，如果个别事实没有顺应某些关系情境，我们似乎很快就会忘记它们；叙事的序列比一张照片这样的静态意象提供了远为有力的情境感。

在对记忆的心理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没有哪个学派关注干扰记忆，即那些可能抑制细节的回忆或者压抑过于令人不安而难以复述的叙事的那些记忆。这个任务落在了弗洛伊德的身上。他发现创伤性的事件是压抑的来源，而压抑则是通过记忆的失效来得以表达的——我用“发现”这个词是因为，虽然这些对我们已经变成了熟悉的观点，但在一个世纪之前却并非如此。

弗洛伊德有关压抑的著作与詹姆斯有关梦幻世界中的叙述的著作相互交叉在一起。弗洛伊德探索了做梦的活动如何使人们自由地创造一些事件并且在他们清醒时不能做的事情之间锻造了一些联系。梦是我们畅通无阻的叙述区域。但只有当它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写出或讲述以促使清醒时的记忆在回应中命名或指定某种东西时，梦才能变成一种治疗性的叙述。重构由此导致回忆；梦的工作变成对象化的了。

弗洛伊德的对象化的思想依赖于在梦故事与生活经验之间创造一种对应关系。许多现代心理学家一直强调叙述的建构却忽略了对应关系的信念。他们鼓励某个人重构另一个同样可信的有关过去的叙述，他们相信，正像一位小说家尝试某个故事的不同表述一样，受过创伤的患者也

能够这么做。而且，就像在弗洛伊德对回忆的治疗中一样，干扰的事件被纳入语言游戏并且被驯化，但现在的重点不是自由讲述，而是自由地命名和联系。

如果你像我这样是一位十足的迪尔凯姆学派，那么，你将赞成把叙述看做唤起记忆的一种工具，如弗洛伊德本人所做的那样。而且，你将相信在回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面无愧色地使用了这个过时的术语——与有关发生之事的叙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取决于单一的叙述者，而是取决于互相言说而又竞相凸显的声音的多样性。用正式的说法，回忆和重构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多样性的条件下才能发生：许多相互竞争的叙述是确立痛苦的社会事实所必需的。只是这种从分享的、梦幻般的状态中争夺集体记忆的竞争的噪音才被我们称为神话创造。竞争的叙述在寻求实际发生之事的的过程中不需要分解为一个故事——而且这就是现代迪尔凯姆学派与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之类的社会思想家的分歧所在，后者相信这些陈述逐渐会聚合为一个单一的、共享的故事。但是，虽然回忆的过程是共享的，但这种解释重新创造了能够转化为相互竞争的叙事的事件和成分。

对理论的这一简单涉猎是理解生活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所必需的，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关注的就是这类事情：即由于现代经济作用而共同遭受伤害的人们，寻求对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在他们的叙述与实际发生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某种断裂：他们已经变成自由的、神话化的叙述者。

共同记忆

我准备举的一个例子是回忆和重构、命名和讲述在奋力挣扎于现代经济制度里的中年和中年美国成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过早的年龄段就变成了冗员，其他人则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和那一代人曾经向他们允诺，他们的劳作生涯将是一个更稳定和更有价值的过程。我将描述的特殊案例涉及一些计算机程序员，他们曾经在一间办公室里为 IBM 公司效力，

该办公室离我在纽约郊县的住处很近。

十扰了他们生活的事件相当特殊；从 10 年前开始，当该公司的发展方向集中在个人电脑而不是这些程序员开发的大型计算机时，他们就开始被解雇了。IBM 的冗员在 6 年前变得很严重，因为公司使用了同样能干的印度工程师，他们为 IBM 写录计算机程序却只拿美国人薪水的七分之一，这些程序——多亏了互联网的魔法——几秒钟之内就传到了本国的办公室。

当这些美国的程序员们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时，IBM 向他们保证终身雇佣，慷慨的好处甚至扩展到一个公司的高尔夫球场以及将来可能得到晋升的一个清晰勾画的蓝图。它是父亲般的公司，就像通用汽车公司和 AT&T 以及日本的大公司一样。那些时光一去不返了。IBM 已经裁员，取消了管理层，并且使它的公司地图在重组其商业重心的过程中更加富有流动性。因此，失业已经成为中层的而不仅仅是劳动阶层的现象。每一拨裁员的幸存者都生活在对下一次斧头将落在哪里的忧惧之中。

这些失业的男子中的一些人在离他们的老办公室不远的旅客车厢旅馆捱时度日。它是一个欢快的汉堡包店，从前在白天是外出采购的女人或放学后抑郁不乐的青春少年消磨时光所借用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我听说了这些身穿白衬衣、打着黑领带的男人，他们守护着一杯杯咖啡，聚精会神地坐着，好像在开一个商业会议，他们试图理解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记忆行为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包括搜寻公司在过去的一些事件或行为，它们似乎是后来发生的变化的前兆。这些回忆的行为包括这样一些点点滴滴的证据，如某个特殊的程序员在完整的 18 轮中被拒绝使用高尔夫球场，或者未经主程序员解释就到达了没有命名的目的地。在这个阶段，这些男人想要的是他们上司预谋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验证他们自己被出卖的感觉；这个故事是，从一开始，“他们”即当权者，就知道自始至终会发生什么。

但这个集体的叙述并不可靠。首先，在公司改制的早期阶段解雇了他们的许多上司，在后来阶段自己也被解雇了，现在在旅客车厢旅馆里也能够找到他们。而且，该公司实际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

期的许多时候做得很差，令人不快的事实可惜被详细记录在它的年度决算表中；旧的公司文化条款显然不利于公司的健全。最后，作为懂道理的成人，这些程序员逐渐明白了，预谋出卖的历史把那些伤害他们的人转变成了粗线条刻画的邪恶人物，而且使某个组织的这个恼人的负担成为在幻想中比在实际中更有效的力量。

所以在重写他们的集体历史的第二阶段，IBM 的编程员们集中在印度的编程员和互联网上，试图寻找外部因素来加以埋怨。对外国人挖了本土美国人辛勤努力工作的墙角的信仰，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这种偏见可以回溯到对 19 世纪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本土反应。其他国家对外国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看法，但其他国家极少像资源丰富而人口缺乏的美国大地那样在过去必然向移民开放。现在印度的编程员被推上了这个古老的忧虑的舞台，而且互联网充当了他们的埃利斯岛^②和他们的移民港口。有几个月，旅客车厢旅馆里的男人们试图把他们自己的麻烦解释为“老外”抢占了公司（他们提到了 IBM 的新总裁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事实），这种看法也使他们在 1994 年投了极右分子候选人的票，要是在更安全的时代，他们会发现这些候选人是荒唐可笑的。

但这个分享的故事又是不可靠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与他们作为科学家、工程师对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发展的好处的信仰发生了冲突。他们也承认来自印度的工作的质量。尤其是，这个叙述的说法是薄弱的。它只是提到了其他地方未知的和没有被看见的其他人的行为；故事的讲述人变成了被动的行动者。在这些编程员建构印度的薪水捣蛋鬼的背信弃义和 IBM 的犹太总裁的诡计的过程中，他们极少互相分享他们自己的工作经验，排除了许多个人的交流。因此，渐渐地，这些编程员就把它置之度外了。

建构集体历史的第三阶段已经矫正了这种被动的行动感，但却是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方式。渐渐地，旅客车厢旅馆的讨论已经发展为思考这些失业男人先前在各自的生活中能够和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避免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这些讨论集中在这样的事实上，即在个人电脑区域中出现行业增长时，IBM 本身却坚持致力于主计算机；如我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编程员都是主计算机人员。在回忆的第三阶段，他们说起在前 10 年，12 年转向个人电脑区域的那些人通过冒险的小生意所获得的成功；

这恰恰是旅客车厢旅馆的编程员们认为他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们责怪自己过于依赖保障，因为他们相信了公司文化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使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职业方案走到了尽头。IBM 的疏忽的历史，印度编程员的来临，由投资人想为他们所持的股份带来短期的高额回报而引起的公司裁员——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种错失良机的更加私密的感觉之中，这些编程员们觉得他们个人要为此负责。这里，到目前为止，这个分享的故事已经静止了。

作为一个友好的邻居和怀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希望这些编程员让公司而不是他们自己来说明他们的困境；我希望他们在幸存者中间组织和酝酿反抗；我希望他们根据他们的记忆行动。但我还是一个富有大学的终身教授；当旅客车厢旅馆的咖啡聚会变得更加私人化时，我逐渐变得沉默了。这不是马克思的领地，而更多地是迪尔凯姆恐惧的地带，只是有一种扭曲。这些男人在回忆中逐渐感到彼此更加亲近，但他们在与更大的社会的关系中变得更加个人化和内向。他们异口同声，但这是“我”的而非“我们”的声音。

我们可以在这些记忆的演化过程中看到回忆与重构之间的一种变化的平衡。重构的自由活动始终在起作用，但回忆的工作突然消失了。被解雇的前两种说法得到客观事件或历史状况的检验：第一个被这些男人对 IBM 的状况的直接了解验证。第二个得到处于他们个人整合感核心的对技术进步的信仰的验证。但第三个说法却消除了这些事实的苦痛和力量。相反，这种说法使过去成为这些编程员自己的一个投射。个人失败的故事把他们当作叙述人而置于这一行为的中心。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个原因是，以第三种方式分享过去使旅客车厢旅馆中的人们之间公开的私人讨论合法化了；这种讨论逐渐染上了亲密忏悔的味道。这是他们的历史最具互动性和最富交际性的说法。而且，第三个说法使他们不再做任何挣扎——这是许多中年人向往的一种休息。这大概就是这些编程员之所以更多地是用听天由命的口气说话而没有对“不行了”和错失良机感到愤怒的原因，尽管他们仍然身强体壮，而且前方还有一个漫长又不确定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

在记忆本身的流动过程中，这第三个说法给叙述者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主观的凝聚感。所有事实和个人事件都与他们自己的意

志和选择联系了起来；第三个说法有一个坚固的中心——我——并且有一个精心编制的情节故事：“我应该做的就是把我的生活放在我自己的手中，就像那些开了新的小公司的程序员那样”

如果认为有关失败的记忆是凝固的和集中的，会违背常识，而且我不想否认这些男人正在感受的痛苦。但在记忆的流动过程中，他们最终以一种静止的形式拥有了他们的过去；记忆已经静止；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的感觉已经变成静态的了

当然，所有个别的案例都是特殊的案例，但我认为这个个别的案例具有更普遍的暗示性。当叙述流动不止时，警示的、艰苦的回忆工作是活跃的，但当叙述凝固和静止时，这种工作就逐渐消失了。处于记忆中心的那种感觉，记忆的主观凝固也有助于社会凝聚。而且不幸的是，在重构过去的过程中，解脱的家常便饭就是放弃。

主观情况具体显示了当共同回忆逐渐消融为一个单一的声音并且当集体记忆变成某个群体单数的“我”在言说时会发生什么。这并非迪尔凯姆所希望的；他的一个学生已经演示了另一个选择并且在其中寄予了他的希望。

记忆的无休止性

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是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的一个追随者，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一位教授，而且在被纳粹当局逮捕之前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被遣送到布痕瓦尔德^③，为了向警察询问他的犹太岳父的下落，他在那里被杀害了。他可以说是为了过去的一个准确的记录而死的。哈布瓦赫的著作现在给许多读者留下了软弱无力的印象；作为通常都很尽职尽责的学生，他试图搞清楚迪尔凯姆理论的细节。但哈布瓦赫进入了他自己对集体记忆的书写；他实实在在地使记忆的自由理论复活了。

他在一项有关耶路撒冷的各种占领者——犹太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教徒——在其漫长历史进程中如何在占领它时改写这个城市历史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了每一个统治政权如何改变

耶路撒冷的中心，以使这个城市的规划符合他们对自己和对历史的认识。例如，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圣墓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因为基督的再度降临似乎已经临近；当十字军骑士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时，他们更新了苦路⁴，这条路的沿途出现了十字架站点（the Stations of the Cross），因为这条街反映了十字军骑士自己对充满痛苦的艰苦朝圣的体验（图 1.1）。当它落入其他教派的手中时，该城市的特征也发生了同样一些变化。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穆斯林教徒来说，犹太教徒视为神圣的哭墙⁵，只不过是磐石穹顶的形而下基础而已，就相当于穆斯林信仰犹太教是为先知的出现而做的准备一样（图 1.2）。

哈布瓦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写作的，而且在这项有关耶路撒冷的中心变迁的研究中，他的迫切愿望是给其他基督徒造成一种印象，即世界上没有持续不变的精神中心。从社会学上说，哈布瓦赫认为，只有当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把他们的耶路撒冷理解为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只有当他们承认每个教派都随着这个城市发展的时间而改变了它本身的神圣场所；只有这样，这些宗教才能变得相互宽容，因为它们就会较少地固守在它们自己的道德地理之中。

哈布瓦赫对记忆工作如何导致这种社会关系有特殊的想法。只有叙述无休无止，回忆才将保持活跃。过去的事实必须被用来抵抗人们的倾向，用他的话说，就是“让他们自己处于他们记忆的中心”，但我们不能假定人们会成为他们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在哈布瓦赫看来，这种批评者只能是那些有着不同“中心”的人——即那些对同样一些战争、打击或特定地点的意义讲述不同故事的人们。中心批评的声音既刺激了回忆也激活了叙述的重构。用文学学术语来说，寻求记忆需要一个非中心的主体。

集体记忆的社会学问题是如何形成许多使彼此非中心化的批评声音。从哈布瓦赫的观点来看，这些电脑程序员在选择旅客车厢旅馆作为见面地点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太密切而且他们又太相像了。他们应该想办法在 IBM 的地盘上进行他们的讨论，还要把他们从前的老板吸收到这个群体中来，甚至可能通过互联网而吸收那些印度人。在这些逆境中，关于解雇的个别叙述就不大可能不受到挑战，因此也就不大可能静止。



图！！ 耶路撒冷的苦路，显示了以“戴荆冠的耶稣雕像”（第二个十字架站点）著称的那个拱洞。

至少这就是哈布瓦赫从来没有去过的耶路撒冷对他暗示的东西，他写作的时候正值欧洲被惩罚和暴力的神话记忆掌控之时。准确地回忆需要以特定的方式重新打开创伤，而这种方式无法靠人们自己来完成：准



图 1.2 在耶路撒冷，穆斯林朝觐圣地的拱顶与犹太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遗址哭墙连在一起。

确地回忆需要一个人们在其中能够跨越差异的界限而向他人发言的社会结构，这是对集体记忆的自由渴望。

这似乎是非常理想化的；例如，最容易误导人的常识告诉我们，人们要避免冲突。但实际上，人们始终栖居在这个状态之中。不仅商业上的竞争者，而且律师、外交官和劳动仲裁人也以讨论相反的陈述并且受其激励为生。社会学家刘易斯·科瑟尔（Lewis Coser）早就表明了言语冲突实际上如何在争论的人们之间创造了社会纽带。争论表明你关心对方所想的事情，这个言说的过程本身——它的托词、论点转换、让步的提出——逐渐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问题是，在我已经描述的那种失业和过早地无所事事的经济体验中，为什么这些冲突关系没有成形，为什么共同受到伤害的集体记忆能够变成一个迂回而不是面对资本主义流行的痛苦。

作为个人财产的记忆

这种迂回有许多体制性的原因。现代经济制度是高度个人化的；因为它剥除集体的支援并且防止经济混乱，它迫使人们像孤立的企业家那样来行动，即使是当他们在大公司效力时。这种工作特点已经被重新界定为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与过去的表现或未来在某个官僚机构中的嵌入没有关系。AT&T的一位董事最近就这种弹性的经济制度如何改变了工作总结说：“在 AT&T，我们不得不推行劳力是临时的这个整体观念，尽管绝大多数临时工都在我们的高墙之内。‘约伯^⑥们’正在被‘计划’和‘工作领域’取代。”旧的职业观念，即在一生中从一个明确的阶段转向另一个明确的阶段，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将不再在一个公司度过他们全部的工作生涯。相反，现在摆在至少受过两年大学教育的美国年轻工人面前的是，他们在其工作生涯中平均至少要换 11 次工作，而且他们需要工作的技能将至少要换 3 次。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生活的叙述不再是一个严实而匀称的故事。

体制性的、个人化的不安全感使主观生活本身高度地不稳定和不确定。在一个没有可靠制度的世界中支撑自我的感觉因此变成了迫切的心理学的营生，因为这种制度破坏了生活时间的连贯性和连续性。我认为，这里正是记忆工作的入口。

这些失业的电脑程序员中的这个最后的记忆阶段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主观凝聚感。我想指出，通过延伸，在目前的情况下，记忆工作比临时的感觉或演绎推理的运作更能够提供使内心生活感到确定和塌实的保证。正是通过记忆我们似乎才拥有了我们自己。换言之，记忆变得像一种私有财产的形式，要防止它们受到挑战和冲突——这些交换可能侵蚀自我的财产。

现代资本主义鼓励把记忆当做私有财产的这种感觉。在其崭露头角时，像 IBM 这样反复无常的机构就在毁坏它们自己的制度记忆；企业想迅速变化，害怕滞留在过去之中。因此，它们避免奖赏长期的服务和经验。非官僚化的制度奖赏没有制度依恋倾向的人；例如，在电脑行业

中，雇主现在用更高的薪金雇佣那些总是跳槽的人而非那些固守在一个公司里的人。制度忠诚被看做个人依赖性和缺乏进取心的一种品行；拥有漫长的制度记忆的人是变化的拖累

在这些情况下，回忆的工作被赋予了一种否定的价值。与官僚巨头等级严密的服务范围不同，一个新型的公司除了有关什么东西需要变化的忠告以外，对它自己的历史并没有兴趣。它当然对激发它的雇员回忆没有任何兴趣；它不是一个时间对话者。而且正因如此，记忆逐渐变成主观的和内在的，即个人私有经验的漫长间隔。

有了这些现实情况，就有理由把记忆的领域看做一个私人的事情，一份我们想保护起来使之免受这个竞争世界的暴力的档案。人们将以一种许可和巩固他们的回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记忆；通过分享他们的回忆，他们将创造在公司的世界中遗失的信任和忠诚的纽带。我绝不是说我认识的这些被解雇的电脑程序员采取了非理性的行动；毋宁说他们的行动是自毁性的。有一本商业杂志最近报道说，45000 名声称在 1996 年被 AT&T 解雇的失业者对他们即将面临的冗员问题采取听天由命而不是愤怒的态度。分享的记忆并不保护我采访的那些工人免受这个世界的侵扰。他们以一种颠倒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通过说他们自己“不行了”，通过反复说他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采取行动。

我的看法是，人们没有准确地记忆是因为现代经济制度不鼓励这一点。防御不在于对过去的压抑，而在于为回忆的主体赋予能力的叙述，这种私自授权是一个人们在其中能够集体共谋的行为。迪尔凯姆和哈布瓦赫的自由之梦已经被这种经济制度中对时间的否定以及有悖常情的叙述主体的自由给挫败了。

结 论

这至少在我看来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文化危机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它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在其中，人们的时间感受到一种对延续性、稳定性或连续性没有兴趣的经济制度以及人们为他们自己建构这些时间价值的方式的损害。

在某种方式上，我们已经回到了达尔文给他的同时代人提出的问题上：即我们如何估算我们把生活的根据放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的时间呢？在达尔文的时代，生物时间的长度似乎使经验的时间没有意义；在我们的时代，经济时间的短暂性似乎也导致了同样的无意义感

“suffering”（受苦）这个词最古老的意义之一是感觉到我们是命运的被动受害者。我采访的中年工人正在与这种被动感抗争，但他们在记忆的劳作中没有找到对抗它的一个良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时间的文化问题需要的是类似于哈布瓦赫在思考耶路撒冷时所想像的那种地点条件——相互冲突的声音之间的相遇，一个生活时间的创伤能够被有效表达的空间。这个过程中的微妙之处，如我已经试图澄清的那样，在于只有当受害者非中心化，只有当——通过他们如何复述过去的无休止性——他们给他们身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寻求某些对应关系时，他们才能发出强大的声音这，就像弗洛伊德所了解的那样，是记忆在应对现实时的痛苦工作

进一步阅读的材料

Connerton, P.,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lbwachs, M., *La Mémoire Collective*, Paris: 1950.

Healy, C., *From the Ruins of Colonialism: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Kroyanker, D., *Jerusalem Architecture*, London: Tauris Parke Books, 1994.

Nora, P., *Les Lieux de la Mémoire*, 3 vols. Paris: Gallimard, 1992. [English translation: *Realms of Memory, Rethinking the French Past*, transl. By A. Goldhammer,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amuel, R. and Thompson, P., *The Myths We Live B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Sennett, R.,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4.

注 释

- ① Jean Martin Charcot, 1825—1893 年, 法国声誉最高的医学教师 和临床医师之一, 与迪歇恩、同为现代神经病学的创始人。——译注
- 纽约市西南部的一个小岛, 曾经是美国入境移民的主要检查站。——译注
- ③ 德国的一个市镇, 1934—1945 年, 德国纳粹在此设立集中营, 屠杀了许多爱国者和战俘。——译注
- the Via Dolorosa, 指耶稣前往殉难地点的路线。——译注
- 公元 70 年被罗马人毁坏的耶路撒冷犹太会堂的残壁, 是犹太人凭吊故国的地方。——译注
- ⑥ 《圣经》中的人物, 屡经危难, 仍坚信上帝。——译注